

捕“光”捉“影”之詩學： 論《觚庵詩存》的思想段位及詩藝境界*

朱興和

[提 要] 在近代詩壇上,俞明震及其《觚庵詩存》表現出深沉內斂的詩性,內涵豐富,值得挖掘。由於較早地完成了現代啟蒙,擁有清明的政治洞見和政治理性,俞明震具備突破政治紛爭的思想能力,成為近代宗宋詩人中的“異類”。由於能體認底層、他者和國族的苦難,俞明震具備較強的情感穿透力,可以抵達國族意識和文化詩學的核心,獲得“國身通一”的詩性體驗。由於從未放棄自我拯救與自我昇華的努力,俞明震具備超越苦難、提振生命、深入本質、攫取詩性的能力,最終獲得淡定澄明的生命體驗。總之,《觚庵詩存》展現出捕“光”捉“影”的詩學特質,也蘊含着深刻的“現代性”元素,在近代詩學脈絡中,達到了較高的思想段位和詩藝境界。

[關鍵詞] 俞明震 《觚庵詩存》 思想段位 詩藝境界

[中圖分類號] I20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2 - 0159 - 12

近年來,隨着對近代中國認識的深進,人們對山陰俞氏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作為俞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俞明震(1860~1918)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學界對俞明震的研究也步步深入,一些生平의 細節,如在保台運動、蘇報案和清民易代中的種種表現,以及他與魯迅的關係等,都得到了比較清晰的抉發。其實,除了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表現,從精神本質上說,俞明震首先是一位優秀的詩人。自清末以來,他的《觚庵詩存》就得到一群詩壇名家(如陳三立、鄭孝胥、陳衍、陳曾壽、陳詩、汪國垣、胡先驕、錢仲聯、冒景璠等人)的激賞。其思想性和詩性本質隱匿得比較深,不易解讀。前輩學人的評點已經表露出類似的感受:比如,汪國垣的評論是“語必造微、意必深婉”,^①錢仲聯的評論是“意味淵永、精思入微”,^②馬亞中的評論是“幽邃雕煉”“瑰麗雄深”,^③陳三立則以“瑰意畸行”四字來概括俞明震的生平和氣質。^④這些表述都指向某種獨特的品格與詩性,實有深入探尋和繼續闡釋之必要。筆者認為,在清末民初的詩學景觀中,《觚庵詩存》之所以奇峰別峙,是因為俞明震看待這個世界的眼光比較特別,能從世事人情中錘鍛出頗有思想深度的獨特詩性,其人、其詩達到了較高的思想段位和精神境界。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陳述一孔之見,懇請方家指正。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近代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現代性’研究”(項目號:20BZW009)的階段性成果。

一、“吾輩辦事不可野蠻”：俞明震的政治見識和實踐智慧

由於長期以來與一群著名的同光體詩人（即後來成為清遺民詩人的那些著名人物）交往密切，俞明震很容易給人造成政治立場“落伍”的錯覺，其實未必如此。幾十年來，學界一直在努力為他“正名”。經過考證，他的正面形象越來越清晰。比如，1895年，他曾親歷日本割占台灣的歷史事件，在保台運動中表現出非凡的勇氣；1901年左右，他成功地整頓了陸師學堂和礦路學堂的學風，使江寧成為魯迅、趙聲、章士釗等人思想啟蒙的原發地；1902年，他親自護送魯迅和陳寅恪兄弟赴日留學，為現代中國培育了幾粒最重要的“讀書種子”；1903年，他在蘇報案中庇護了一批革命黨人；辛亥革命中，他拯救了革命黨人王之佐的性命；等等。這些考索試圖還原俞明震“維新黨”的本來面目，或者試圖將其定位為魯迅所暗示的“老新黨”。^⑤但筆者更感興趣的不是俞明震究竟在政治觀念上“進化”到何種程度，而是他在面臨政治思想壁壘時的種種表現。

隨著細部了解的深入，可以發現，俞明震具備在歷史夾縫中生存的非凡能力。比如，戊戌變法前，他實際上已成為一名維新黨，變法失敗後，他的師友如翁同龢、宋伯魯等都因鼓吹維新而遭到處罰，而他卻毫髮未損。又如，在辦理蘇報案時，他冒有很大的政治風險，但既保護了革命黨人，又沒有受到任何處分。辛亥革命發生後，他既飛書阻止陝西革命軍的西進，又反對甘軍東征，消極對待長庚的命令，還放棄快速升遷的機會，直至稱病辭職。事實證明，他的辭職是明智的，因為當時的甘肅政壇殺機四伏，很快就發生議長李鏡清被刺身亡的血腥事件，而俞明震的繼任者趙惟熙雖然被推上甘肅都督的高位，卻也很快在權力鬥爭中落荒而逃。^⑥不得不說，俞明震有比較高超的處世技巧。但是，此種能力並非官場中常見的老到圓滑，而是一種基於清明理性的實踐智慧。

俞明震的政治表現異乎常人，在朋友圈中也比較獨特。比如，在對待辛亥革命和民國政權的態度上，他就與朋友們有著非常微妙卻很重要的差別。1912年2月18日，清帝遜位詔下，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北面而跪，叩首哀號”，^⑦沉浸在強烈的政治悲情中，而俞明震的第一反應則是“預料事當爾，此意至淒切”，“心知人世改，愁到海水竭”。^⑧這裡，有一個很微妙的情理衝突。與那些遺民朋友一樣，自從進入體制伊始，俞明震就將自己的人生與清帝國的命運牢牢地捆綁在一起（《述哀》詩中，即有“人以官為家，遂以官立國。”之語，第53頁），因此，對清朝的崩潰難免有些傷情。但是，在理智層面，他又認為清朝的崩潰源於“親貴集大柄，四海各休戚”（第53頁），即，虛偽的預備立憲掏空了清廷的政治地基，從而導致了整個政權的崩潰。這裡表現出來的冷峻理性大可玩味，且非孤例。1912年1月28日，他在請辭甘肅布政使時也說：“十年涕淚今何補？一病倉皇死未安。擾擾世隨人意改，冥冥天在霧中看。”（第52頁）顯然，他認為人心和天命的更改是清廷政治失策的必然結果。1912年3月，俞明震取道河套回京，親眼目睹了甘軍借鎮壓革命之機在寧夏所造成的慘劇，^⑨親耳聽見幸存者的哭訴，^⑩留下一句非常冷峻的評論：“無為怨回紇，生事日千端。”（第56頁）他認為清朝的覆亡主要是因為自身的問題，不必歸咎於人。這一認識顯然已經越過清朝政治意識的界限。細讀《觚庵詩存》，不難發現，俞明震很早對清末政局和清廷虛實有了比較冷靜的分析。比如，1907年，他曾對清朝權力中樞的政治運作有過一針見血的批評，有詩云：“百年積弱有天意，朝三枉自尤群狙。”（第27頁）1910年，他已看穿預備立憲是場鬧劇，有詩曰：“蒙馬以虎皮，一闕終自窘。”（第42頁）後來，胡先驌曾拈出此語，證明俞氏頗有政治遠見。^⑪若干年後，夏敬觀也在《哭俞恪士》詩中追憶說：“早料蟻穴堤，一潰難止汨。”^⑫可見，他們對俞明震的政治遠見都有深刻的印象。其實，俞明震對清朝政治的失望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895年的保台運動。在《台灣八日記》

中，字裡行間流露出他對台灣巡撫唐景崧和清廷中樞的高度失望。¹³事後，他轉向維新，並對革命與共和保持高度開放的態度。這些都與 1895 年以來的那種與日俱增的失望有很大的關係。

基於上述邏輯，民國初年，在“出”與“處”的問題上，俞明震的表現就非同尋常了。他的遺民朋友大多恪守名節，斷然拒絕來自民國的各種誘惑。比如，李瑞清就是高蹈拒聘的典型。1914 年十月十九日，李瑞清曾對趙爾巽說：“瑞清，有清之臯（同“罪”）臣也……久已黃冠為道士，不復願聞人間事矣。”（《與趙次珊卻聘書》）。¹⁴但是，與此同時，俞明震卻接受了平政院肅政使的職位。對此，陳三立曾流露出一不無惋惜卻又不乏體諒的複雜態度。¹⁵這是因為，李瑞清和陳三立都是以清遺民自居的。但有意思的是，俞明震卻沒有表現出任何遺民傾向，也沒有流露出清末民初遺民詩人在面對出處問題時常見的那種情理衝突。1915 年他的辭職南歸也並非出於對清廷的愧疚感，而是由於對袁世凱政府的高度失望。在出處之間，俞明震的表現既不同於那些以遺民自處的清流友人（如沈曾植、陳三立、李瑞清、陳曾壽等），也與那些“諸夏無君出處輕”的“名士”們（如樊增祥、易順鼎等）完全不同。胡先驕曾將清末民初的文人分為五類，將俞明震與清流派及偽名士區分開來，認為他屬於“有志於維新，對於清室初無仇視之心，亦未必以清室之覆，為天維人紀之巨變，而必以流人遺老終其身者”的一類，所以，他“不必以遺黎自居”，出仕民國也不存在任何政治不正確和人格上的污點。¹⁶此種辨析相當精準，因為這是一種超越理念之爭的開放的視角。胡先驕是留學哈佛和加州大學的新生代學人，有此識見不足為奇，而俞明震則是長他三十四歲的傳統士大夫，能夠如此開放，實屬難能可貴。筆者認為，俞明震思想的獨特之處在於能有意無意地破除政治觀念壁壘，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困擾大批近代知識精英的“意締牢結”。¹⁷

對於何為君憲、何為共和、何為現代政治、何為理想中國，俞明震有其獨到的認識。這才是他自己所主張的“悶抱遠識”和陳三立所稱道的“瑰意崎行”在政治層面上的內在意蘊。¹⁸1900 年開始主管礦路學堂時，俞明震曾經出了一道令國文老師惴惴不安的作文題目“華盛頓論”，¹⁹從中約略可以解讀出他對現代政制的濃厚興趣。這種導向在當時是相當前衛的，相比之下，同一時期的陳三立則顯得有些保守。1907 年，俞明震在贛寧道台任上有詩云：“耕鑿但知忘帝力，閉關終古是凡才。”（第 24 頁）又云：“欲民通生計，先使變土音。豁蒙即治理，閉關皆弱民。”（第 26 頁）這些詩句透露出他對中國傳統政治理想和現代政治理念的某種區分，暗示的意思是，中國上古的政治理想（如《擊壤歌》所追慕的政治烏托邦）是封閉自足的，而現代政治的出路則是開放與啟蒙。²⁰他還說過：“新民有術不能道”，“憲法不啟愚民愚”（第 27 頁），言下之意是，啟蒙和培育新民，乃是推行現代憲政的前提條件。這些認識都具有非常明確的現代導向。

與此同時，俞明震藉以認知世界的知識結構也已完成現代轉換。比如，1907 年的《長夜吟》有云：“盤空大地如車輪，日光所被物態新。若使地軸不自轉，誰是茫茫長夜人……錯怨東方不肯明，那識西天日方午！”（第 27 頁）顯然，作者已經接受了以日心說為核心的宇宙新秩序。時空觀念的現代化與政治和倫理觀念的現代轉型通常是相互支撐的。在俞明震內心深處，傳統的忠節倫常觀已悄然解體。在《觚庵詩存》中，找不到對清朝和傳統綱紀的迷戀，因為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對皇權政治及其背後的經學義理有比較現代的理解。有則史料值得玩味：1911 年，作為甘肅提學使，俞明震曾召集省垣職教人員，對他們說：“科舉廢了，學生需要學習科學，死板地讀經實在沒有必要……將來舊式的讀經，尤其小學中的讀經，必得改變。”²¹此番言論一度引起以劉爾炘為首的保守派學者的強烈反彈。另外，還可略做比照的是，直到俞明震去世之後，陳三立還在《俞觚庵詩集序》中大力抨擊辛亥革命對人倫秩序的破壞，認為“辛亥之亂興，絕義紐，沸禹甸，天維人紀，寢以壞滅

……劫殺焚蕩，烈於率獸。”^②在陳三立那裡，三綱六紀與天地秩序是同構的，是中華政治和國族命運的終極依據，但在俞明震那裡，此種組合已悄然解體。在政倫觀念上，兩位密友的確存在非常微妙而且也很重要的差異。

關於宗教，俞明震的眼光也值得關注。1907年，清朝派他去江西處理教案。透過詩作可以感受到，此時他對基督教的了解還比較膚泛，^③但他將啟蒙和科學視為解決教案問題的根本辦法，倒是頗有眼光的。幾年之後，他的看法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12年，當他行經河套地區，看到外國教會引水灌田、改造荒原的奇跡，不禁發問：“碧眼誰家子？新開百道渠。”還忍不住感歎：“教民過七千戶矣。”（第57頁）顯然，此時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複雜。在文明對比中，他似乎有些失落。總之，在俞明震的行跡和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一種開放的精神導向。這是他能超越“意締牢結”並在歷史夾縫中靈活自處的根本原因。

基於以上分析，重新審視俞明震在蘇報案中的表現，就別有滋味了。重回歷史現場，不難發現，封殺《蘇報》乃是清帝國的國家意志乃至國家機密。1903年五月下旬，針對愛國學社和《蘇報》，可以說，清政府已悄然布下一張天羅地網。上至帝后、軍機處、外務部（主管是大學士張之洞），下至沿海沿江督撫（主管是兩江總督魏光燾和江蘇巡撫恩壽），都是這張捕獵網的組成部分。具體辦案的是候補道台俞明震和上海道台袁樹勳，主動介入並不斷發號施令的則是湖廣總督端方。端方不僅通過布插在上海的耳目（如福開森、趙濱彥、梁敦彥、梁鼎芬、辜鴻銘、金世和等）在幕後遙控操盤，還玩弄權術，讓辦案人員彼此牽制。比如，閏五月十二日，端方曾密電魏光燾：“俞道明震之子大純，現遊學日本甫回，聞大純在日剪辮入革命軍，悖逆無人理，俞道深惡其子，然不可不防，請密飭滬道（袁樹勳）一電，隨時留心。”^④同日，端方還曾發電密詢探員志贊希（即珍妃胞兄志鈺）和趙鳳昌：“滬道（袁樹勳）心思手段如何？俞道（俞明震）舉動如何？”^⑤如此布局，還不放心，居然還“密委金守鼎（湖北知府金鼎）即日赴滬，與福開森及其（即金鼎）弟世和妥密布置”。^⑥手段狠辣如此。果然，次日，志鈺和趙鳳昌密覆端方：“俞（明震）恐不肯深求，而於此案未見格外才力。”並獻策說：“竊為公計，暗中加緊，不宜著跡。”^⑦可見，奉命查辦此案實是一項非常危險的政治任務，對此，俞明震不可能不心知肚明。在此背景下，再看他的表現，就非同尋常了。若干年後，章太炎等人透露出俞明震辦案時的諸多細節。^⑧比如，俞明震下令捕人前，先約談吳稚暉，對他說“奉上官條教，來捕足下，但吾輩辦事不可野蠻，有釋足下意，願足下善為謀。”^⑨而且，俞明震是以兒子俞大純的名義在“上等私門妓之巢窟”“大興里”秘密約見吳稚暉的，^⑩面談時希望吳氏能勸《蘇報》降低論調。面對吳稚暉的反駁，俞明震說“（《蘇報》言論）太利害，亦叫當道受不了”，^⑪然後當面洩漏抓捕名單，並邀請吳稚暉一起用餐，趁機勸他出國，告別時甚至建議雙方以化名的方式保持聯絡。開始捕人時，先抓的是《蘇報》館賬房和館主陳範之子，而且故意在抓捕名單上將陳範誤作兩人，巡捕碰到陳範時，還裝做不認識。這些手段讓一些當事人莫名其妙，連吳稚暉都認為這不過是應付上頭的“官僚慣技”而已。^⑫

後來的研究者也的確是這樣解讀的，比如，王敏就曾評論說：“老於世故的官員辦案，自有其一套潛規則，對上交代得過去，對下說得過去，不偏激，留後路。”^⑬其實，“老於世故”四字，哪能概括那種在“危險地帶”巧妙行動的實踐智慧？五十四年之後（1957年），當事人即當年《蘇報》主筆章士釗曾回憶說，《蘇報》案初起而查辦人員未定時，他的老師俞明震“恐傷士類，曾爭取此案入手”，對學生的“叛逆”和“挑釁”行為，“陽怒之而陰佐之，其情不為世人所知”，^⑭倒說得在情在理。總之，俞明震在處理《蘇報》案中，表現出很高的實踐智慧（如，暗渡陳倉，敲山震虎等），表現出過人的膽

略和寬容的精神。雖然不能排除其中或許也帶有私情的考量(比如,保護兒子、友人和門生),但他之所以如此行動,主要還是因為具有卓越的政治見識和高超的實踐智慧。實踐智慧與思想能力,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

二、“國身通後見人天”:俞明震對國族苦難的體認

俞明震最成功的作品(如度隴諸作)被公認為最得“杜味”,^⑤有“盤鬱蒼涼”之感(錢仲聯)。⑥前人紛紛從其詩學淵源中尋找原因。討論得比較多的是他與老杜和簡齋的關係。比如,陳衍認為俞明震詩“蓋由王、孟而進規老杜者”。^⑦此外,陳三立加上錢起,陳詩加上莊、列、魏晉,汪國垣則注意到柳宗元對他的影響,等等。從閱讀史來探尋詩風詩格的成因,自然很有必要,但更為深入的理解則有賴於對詩人精神本質的追問。

讀《觚庵詩存》,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悲哀感如影隨形。悲哀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詩語來說,是“國身通有淚千行”(1909年,第37頁)。^⑧國身通一的思想來自於漢儒董仲舒,^⑨精神淵源則可追溯到周公和孔子。其實,個人哀樂與國家命運交感相通是儒家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自孔子、屈原直至杜甫、范仲淹,一直到近代一流人物(如陳三立、沈曾植、陳曾壽、王國維、陳寅恪等),莫不如此。但俞明震對國身通一之旨有其獨到的認識。要義在於,他對個體和國族的苦難比大部分同代詩人有更真切的體認。

在身份認同和階層意識上,俞明震與朋輩有非常微妙的差別。按理說,俞明震二十八歲中舉,三十歲中進士,接下來在體制內生存,雖無達官顯宦,可以說還算“體面”,應該對生活比較滿意才是,但事實上,他卻經常沉浸在悲哀感愴的情緒之中。這是因為,早期生命經歷早已塑造出他老成持重、沉哀內斂的精神骨格。

關於俞明震的早年生涯,幾乎沒有文獻可資參考。或許,可從《觚庵詩存》收錄的第一首詩歌《出都宿楊村作》(作於1879年)中解析出俞氏早期生平的某些信息。詩中描述了父病母老、弟妹幼小、貧困無助的悲慘家境,鮮活地記錄了一位十九歲左右的青年為了一家的生計而遠涉海濤、四處旅食的淒惶與哀苦。終章云:“關河多浮雲,四顧天地窄。”(第2頁)一“窄”字,形象地刻畫出寒士生存空間之窄逼。詩中有云:“俯仰二十年,悲愉感今昔。”(第2頁)說明俞明震在童年和少年時代已充分體驗人世之辛酸。八年之後(1887年),他在漢口辭別范鐘,又有“十年俯仰歷千劫,零落江湖哀怨多。”(第8頁)之句,亦可證明,二十七歲之前的十年,俞明震仍然在品嘗人生哀苦的滋味。《觚庵詩存》卷一充斥著“窄”、“淒”、“寒”、“愁”、“哀”等字眼,隨處都可以感受到舉目維艱之哀楚。後來,他雖然有幸進入清廷的官僚體制,但早期經歷如此刻骨銘心,已經成為他生命中最濃鬱的底色。可以感覺到,後來他雖然成為一位“官老爺”,也經常出入詩酒唱酬之所,卻始終沒有忘掉自己的本分。有一案例頗為典型:1901年某日,陳銳在江寧請客,待俞明震而不至。不久,俞明震派人送來詩柬,陳述了兩條辭宴的理由:其一是畏寒(所謂“寒風吹脚冷如冰,多恐回家要上燈”);其二是隨從人員的“車飯錢”不易打發(所謂“轎夫二對親兵四,食量如牛最可嫌。轎飯若教收折色,龍洋八角太傷廉”)。^⑩黃濬將此事當做幽默掌故予以記錄,但他的不赴宴,恐怕主要不是怕冷,而是出於經濟上的考量——一方面,他付不起自認為可以拿得出手的轎飯錢,另一方面,又不願在轎夫的小費上打折扣,為免尷尬,只好選擇缺席。俞氏的真性情和為人處世之原則,可見一斑。

因為早歷艱難,俞明震很能換位思考,對“他者”,特別是底層和弱者的苦痛,有比較深切的體認,這就使他具備某種超越階層局限的能力。比如,在《鴻嗷歎》(第3頁)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二

十歲的俞明震在面對老翁、饑民和乞丐時的悲憫心腸。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面對底層人民和弱者時，他完全沒有官紳階層或一般文人通常在自覺和不自覺中流露出來的身份自矜。他的目光是悲憫、溫厚和平等的。《觚庵詩存》中證據很多。比如，1909年，他在江西遊崆峒山時曾投宿農家，有詩云：“煮茶燒筍邀客餐，怕聞父老談辛酸。山茶一叢雜瓦礫，任他蛱蝶飛成團。別有深情向平野，多謝農夫飼歸馬。合無人處看春光，相逢同是悠悠者。”（第34頁）透過詩句，可以感受到俞明震雖然是道台，但在與農夫交流時，態度非常平等、誠摯，完全沒有長官姿態和文人常有的虛浮習氣。1907年，當他初到贛州時，並不喜歡這個窮鄉僻壤，以至於“歸心如轉輪”（第26頁）。可是，兩年後離任時，“父老拜馬前，欲語尚瞻顧。”（第35頁）令其戀戀不舍、情懷惻惻，覺得滿山的鷓鴣和杜鵑都在挽留自己（“聲聲行不得，鷓鴣留我住。林外杜鵑啼，道不如歸去”，第35頁）。可見，由於心靈的感通，兩年之中，俞明震已與當地父老結下深厚情誼。同樣，1911年到西北上任時，俞明震因親眼目睹“民生樸嗇，憔悴山林，陶穴以居，汲泉而飲”而不免“愀然不怡，穆然深思”（第278頁）。當他看到西北人民還住在窯洞裡時，不禁感歎：“奈何三千年，穴居惟堽戶？”（第47頁）情緒不免有些低迷悵惘。這些細節表明，俞明震身上有一副同情貧弱者的悲憫心腸。他的誠摯令人感動。對民生疾苦的體察使其產生強烈的責任感，於是，他工作起來非常賣力。據陳詩描述，俞明震“自夏徂秋，勤勞夙夜”（第278頁），試圖改良甘肅的教育狀況。俞明震自己也曾寫給陳衍一封信中說“頗欲應機立斷，殫精以赴”，還說自己幹起活來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馬兒（所謂“處瘠則勞，如駒在勒。”）^①這種責任感令人感動。

此外，俞明震悼念亡妾的詩作（至少有五首相關作品）歷來為人所忽略，從中也可抽繹出俞氏的性別平等意識和悲憫情懷。如《哭劉姬》詩云：“已訣忍再見？返恨死難速。止我勿登樓，呻吟抵床褥。那知樓下人，腸斷不可續。惟餘百悔心，迸作一聲哭……人病爾服勞，爾病仰空屋……回身視家人，早死庸非福？淚盡忽失笑，待我湘山麓。”（第60頁）真是字字樸實，哀樂深沉。又如《園居雜詩》（其一）云：“樹葉覆我身，樹根入黃泉。黃泉我不見，根葉常牽連。為報泉下人，吾衰不如前。”（第61頁）這是沒有標榜悼亡的悼亡詩，真是字字血淚，豈止情真意切而已！近代中國詩史上，悼念姬人的詩作並不鮮見，比如，康有為、吳保初等人都有此類作品，但以俞詩最為動人。原因在於，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帶著豔情或把玩的心態，都殘留著一些男性中心主義的遺毒，唯獨俞明震能與姬人哀感相通，因為在其思想的深處，有一種很動人、很現代的性別平等意識。

事實上，只有真切、平等地體認到“他者”的苦難，才能真切地體認到國族的苦難。只有深入個體和國族苦難的核心，才能真正實現“國”、“身”的交感相通，進而真正觸及詩歌的靈魂。否則，所謂的“國身通一”並無實質性內容，容易流於叫囂或做作。這是中國一流詩人（比如老杜）感人至深的秘訣，而俞明震最好的作品之所以被公認為深得杜味，原因大概正在這裡。

從這一角度，再來審視俞明震的西北詩作，就別有一番滋味了。且以《過邠州》為例。詩云：“茫茫古邠土，直接隴西路。我來值蠶月，戒行不待曙。晨光與麥齊，晶瑩綴寒露。微月在棗林，不見栽桑處。王化首明農，但取衣食足。智識與世新，生活有程度。奈何三千年，穴居惟堽戶。日出不逢人，高原莽盤互（此處出韻，疑係“古”字之誤）。始知地上人，得水乃生聚。涇流日淺縮，千尺俯塵霧。人事漸東趨，天心厭西顧。不見古雍州，八水已非故。滄海變桑田，吾何憂旦暮？”（第47頁）此詩蒼莽高古。眾口一詞，說他深得杜味，卻未必能探本原。筆者認為，俞明震與杜甫西北詩作之所以有蒼莽溫厚之味，在於他們能體認到中國文化在西北原生地的深刻苦難，在於他們能在現場“正入切近而達乎本源”，^②從而獲得了獨特的體悟和詩歌穿透力。實際上，寫作此詩時（1911年

春),俞明震由洛陽一路西進,一路體認著上古以來中國文化的脈動和悠悠國史中的苦難。《過邠州》豈止直通老杜而已,簡直上溯到了《詩經·豳風》的時代。詩人腦海中盤旋不已的正是《豳風·七月》中“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類描述初民在此生息的千古名句。可是,桑樹沒有了,一路上只能看到西北人民的苦難。只有到了實地,才能感受到三千年文化原發地的氣場,從而引發出關於文明衰變的哀傷情緒。所以,此詩頗得山川之助,既有厚地高天之感,又有深沉的歷史感,因為詩人的靈魂已觸及吾國吾民苦難歷史的本根,從而達到國身通一、詩史合一的藝術高度。俞明震的陝甘詩作和河套組詩,基本上都可以如此解讀。

由於早期經歷的苦難和天賦的敏感性情,俞明震對底層、他者的苦難有著非凡的體認能力,於是能夠超越自身所屬的階層,真切地體認到國族和文化的精神苦難,進而能夠如其詩語所說的那樣:“國身通後見人天”(第18頁),即真切而精微地表達出他所感知到的天人交互。俞明震詩歌的“幽深”、“幽邃”、“蒼莽”、“深濃”,或許可以從這一角度獲得新的闡釋。

三、“心自沉冥氣瀟灑”^④:俞明震晚年的自我拯救與藝術升華

俞明震曾經說過:“詩人非閔抱遠識,必無佳構。”^④以上兩節,大致闡發出俞明震本人所具有的“閔抱遠識”及其精神內涵,即,一種對現代政治和國族前途的理性洞見,和一種對生民疾苦及國族苦難的深刻同情。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態中,俞明震的抱負完全沒有實現之可能。因此,經歷不斷的失望之後,退隱便成為其人生最後的選項。

早在贛寧道台任上(1909年),俞明震就曾對陳三立說過:“便擬從容理歸棹,從君袖手看神州。”(第37頁)又有詩云:“微覺一峰青向我,百年心事久頹唐。”(第38頁)顯係升遷無望、報國無門之後的嘆息。1910年,陳慶年隱居山林,他很羨慕,嗟嘆自己志在四方,却“動與時抵觸”(第43頁)。但直到辛亥革命爆發,他才獲得辭職歸隱的契機。然而辭歸之後,他又心有不甘,於是便有1914年出任平政院肅政使之事。但是,袁氏政府的表現很快又令其萌生退意。1915年年末,在洪憲帝制的鬧劇中,俞明震終於脫身南歸。他選擇在一個最美的地方(蘇堤南側之小南湖),與一位最投緣的詩人(即陳曾壽)結鄰而居。自1916年秋前至1918年12月,俞明震生命的最後兩年,基本上都在湖邊度過。他的心境和詩境進入一個全所未有的新階段,值得仔細研味。

俞氏後期詩作中,《遊西溪歸泛舟湖上晚景奇絕和散原作》是眾口稱賞的作品。全詩如下:“西溪暝煙送歸客,艇子落湖風獵獵。蘆花淺白夕陽紫,要從雁背分顏色。頹雲掠霞沒山腳,一角秋光幻金碧。欲暝不暝天從容,疑雨疑晴我蕭瑟。憶看君山元氣中,滄波一逝各成翁。請將今日西湖影,寫入生平雲夢胸。”(第79頁)此詩對西湖光影世界的捕捉與描摹極為精彩。俞明震的一大特點是對色彩和光影異常敏感。程羽黑曾在《論觚庵詩》一文中,羅列出俞明震描摹光影的系列名句。^⑤細閱《觚庵詩存》,的確,吉光片羽,所在皆是。但筆者還想補充兩點意思:其一,俞明震對光影的敏感由來已久。比如,1879年,俞氏行經洞庭時,年僅十九歲,就曾留下“日躍天無根,金光射萬隙。蛟龍失曉睡,采錯周六極”之詩句(第2頁),壯麗處不比後期作品遜色多少。其後,凡所經行之地,如洞庭、淶水、贛水、濃溪、黃河、鹹水、玄武湖、十剎海等處,都有刻摹光影之佳句。當然,俞氏晚年對西湖光影世界的把握更為集中、更加絕妙。可以說,《觚庵詩存》中的光影寫作貫穿始終,而且老而彌醇。其二,俞明震身上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捕捉光明”的獨特詩性。由於本質中的“趨光性”,他對光影有著非同尋常的迷戀,因而發展出一種非常精微的“捕光捉影”的詩學,即,一種獨特的詩性氣質與審美品味。

與其說俞明震善於捕捉色彩和光影，倒不如說他是調配色彩和光線的高手。有意思的是，他對冷暗色調獨有情鐘，筆下景物大多是幽暗孤冷的。比如，《觚庵詩存》中有許多這樣的表達：“宵然入深黑，遺世真吾徒。”（第 65 頁）“安得濃淡山，變盡滄溟色？”（第 66 頁）“人間果何世？破筆入蒼莽。”（第 68 頁）“向曉亂山分紫翠，隔年寒漲沒菰蒲。”（第 71 頁）“思逐遠鐘同脈脈，身經殘夢但冥冥。”（第 74 頁）“攜壺賭酒少年事，俯視落照同幽深。”（第 76 頁）“霜天色黝黯，補以湖面青。置身人間冷，借景皆空冥。”（第 78 頁）“峨峨獅子峰，匿影萬山窟。甕底海潮音，煙中古苔色。”（第 81 頁）“蒼然古畫圖，對此心神肅……曳杖出青冥，止觀吾亦足。”（第 85 頁）“暮色蒼然來，人天渺一粟。”（第 78 頁）等等。可以感覺到，詩人長期沉浸在幽暗之中。但正因為如此，他偶爾捕捉到的一抹亮色，足以令人神清意遠。比如，集中有這樣的句子：“濕螢飛漸稀，陰陰一湖白。”（第 66 頁）“錢江背城去，團團一湖白。”（第 87 頁）“言尋滿覺隴，遠見炊煙白。”（第 84 頁）“春風入雲際，炊煙相與白。”（第 82 頁）更不用說上面提到的名句“蘆花淺白夕陽紫……一角秋光幻金碧。”（第 79 頁）他所有的光線，都是在冷暗色調的烘托下，才展示出的一抹明麗的神采。如果沒有大量幽暗背景的烘托，那抹亮色就失去了神奇的意味。藝術史家貢布里希曾專門探討過“陰影”（shadow）與“光”（light）的關係。他說：“陰影很少是灰色的，它們會因與周遭環境的顏色對照而展示出不同的色相。”又說：“陰影的形狀和邊緣線及其色彩都能告訴我們照明光的性質。”他還發現，畫家可以用陰影來揭示關於即將來臨之物的預言”。^{④6}其實，那即將來臨之物，就是可以救贖苦魂的終極真理。俞明震後期詩作展示出大量的陰影和烘托於陰影之上的亮光，這是近代詩史上非常特別的現象。這些詩作不僅有很高的審美品味，而且還有很濃的思想含量。海德格爾在評論荷爾德林時曾說：“詩人看到一種閃爍，這種閃爍是通過它的幽暗而得以閃現的。”^{④7}顯然，那些在幽暗中閃爍不定的光芒，正是俞明震借以表述自身存在感受的象徵性的符號，是他長期淪陷於幽暗境域而最終獲得救拔的徵象。那東西異常稀缺，來之不易，所以尤其動人。

當然，瞥見真理之光，並不等於自我救贖的完成。真理之光閃現之後，詩人的生命仍將在一定時段內隨著明暗交替的波形運動而載沉載浮。1916 年春，當俞明震最終選定杭州作為人生的終點站時，寫下“夢長夢短了無跡，窗暗窗明過一生”（第 74 頁）。顯然，這也是他關於自己人生走向的一個隱喻。他知道餘生已經有了明確的方向，但也知道明暗博弈的生命慣性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最後兩年，借助西湖一帶的山水和人文氣場，特別是頻繁造訪的寺廟和道觀，俞明震對佛、道二家義諦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悟，從而將自己的生命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他將生命的痛苦和快樂意象化、色彩化，轉化為獨特的“光影詩學”，從而形成“沉憂靡麗”（胡先驕語，第 321 頁）的美學風格。他筆下所有的光影，無非是內心深處的幽暗與光明、沉痛與浪漫的博弈。他並沒有完全驅除內心的幽暗，但那幽暗中生長出越來越多的光明。比如，1918 年某日清晨，剛剛起床的俞明震看到了一個美得令人驚訝的西湖：“昨夜南山雨，雷峰淨如拭。澄波倒天影，雲來滿湖石。石底一星明，餘光隨槳沒。忽驚鷗背紅，荷邊上初日。曙色分遠近，湖光有明滅。漸覺東方高，市聲出煙際。”（第 92 頁）這首詩精準地描畫出俞明震瞥見西湖山水的澄明與喜悅：經過一夜雨水的清洗，世界無比潔淨了。他覺自己曾經為潔淨自己付出過畢生的努力，此時此刻，靈魂煥然一新，就像雨水洗禮過的雷峰塔一樣潔淨。他看到西湖在天光雲影中搖漾，正如自己的心鏡一片澄明，可以鏡鑒萬物。城市的喧囂漸漸消退了，意味著詩人漸漸擺脫了塵世的困擾，與世界拉開了距離，為心靈的自由爭取了足夠的空間。更妙的是，西湖上波光漾動，鳥背和荷葉上的霞光正在熠熠生輝。世間萬物如此可愛，因為它們正在回應那神奇而溫暖的光源。此時此刻，《觚庵詩存》中揮之不去的幽暗完

全消退了,只剩下純粹的澄明和喜悅。這樣的驚喜,不到最後時刻,是不會造訪詩人的筆端的。

筆者在研味俞明震晚年行跡和作品時,也不得不相信,他最終是達道的。比如,臨終前的《病甚口占》有云:“夢邊無悔懼,燈外即鴻蒙。漸悟形骸累,終慚淡泊功。”又云:“哀樂隨年盡,星河向曉明。了然無觸處,夜氣與心平。”(第94頁)雖然還有一點愧怍,畢竟意識清醒,心境平和,無憂無懼,頗得佛道二家之力。另外,根據沈曾植的描述,當他們見最後一面時,俞明震大病初愈,心情舒泰,氣象溫和,離別時大笑而去,狀態很好。^⑧據諸宗元回憶,俞明震死前兩日,謁廟歸來,還曾扣門過訪(第394頁)。據陳曾壽追憶,俞明震去世前一天,還跟他有過非常愉快的交流,提及後事時,俞明震頗為談諧超脫,比年紀輕輕的他還要想得開。^⑨從友人追憶的這些細節中,可以感受到俞明震在最後時刻的從容與澹定。

總之,俞明震後期詩作展示出生命的不斷深進和不斷擢升。借助對冷暗色調的敏銳體察和精準描摹,後期俞明震發展出一種獨特的詩學趣味。他始終在幽暗背景中捕“光”捉“影”,最終,如願以償地獲得到內心的澄明。他的西湖詩作如同秋天的樹葉,紋理複雜,明暗諧和,色彩斑斕,充分表達出內心深處的複雜與豐沛,處處流露出一種成熟、深刻的美。筆者甚至認為,他對光影的捕捉能力,與印象派畫家有些神似。西方學者有言:“印象主義繪畫反映的是內心對世界的感受。”“追求一種攝影師無法達到的深層次的真實。”^⑩俞明震的西湖詩作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蘊藏著某種不易覺察的“審美現代性”,比如,對瞬間光影的捕捉,對獨語與冥思的沉溺,對暗黑意象的偏愛,等等,隨處可以感覺到他的精神困境及其突破困境的不懈努力。因此,筆者認為,俞明震具有超越苦難、提振生命、深入本質、攫取詩性的能力。

俞明震的性格大概比較沉默、內斂,讀其詩,察其小像,約略可知。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四有云:“確士多靜者機,訥於語言。”^⑪《觚庵詩存》中也有類似的自我評價,比如,“人前惻惻無高論,江上悠悠入晚晴。”(第28頁)他不太說話的,因為他的心中有一個黑洞。但他也有善於談諧談笑的一面。比如,上文提及的辭宴小掌故,就有某種冷幽默的味道。夏敬觀也說,俞明震“善為滑稽詩”,“所作滑稽詩尚多”,^⑫可惜沒有留存下來。幽默,其實是一種自我釋放。深陷於幽暗的靈魂,有時候需要通過戲謔的方式來化解或沖淡那些濃重的悲哀。有時候,幽默與沉哀在同一個人的身上並不衝突,反而構成了一種深刻的諧和。可見,俞明震擁有自我開解的能力,但嚴肅詩作是他自我拯救與自我升華的主要通道。借助詩歌,他的確展現出強大的自救能力。在西北組詩和杭州詩作中,潛伏甚深的生命“真力”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如果說,西北詩作之成功,在於國身的通一,即對文化本根的親緣體認,那麼,杭州詩作的成功,則是詩性生命的自省、實踐與完成。

四、結語:“龍性難馴,則為其本色”

經由以上分析,可以再來品味俞明震的詩學主張。俞明震論詩,有三層意思:其一,“尋常人能為之詩,不作可也。”(第295頁)此語初見於趙元禮之《藏齋詩話》。據趙元禮記載,1894年,俞明震客居天津時,住在范當世家,曾對王守恂說:“君欲為詩,流俗人能為之詩,吐棄之可也。”(第295頁)可見,俞明震很早就形成了很高的詩學標準。其二,“遣詞宜用子部罕經人道語,方能壁壘一新。”^⑬此係俞明震千錘百煉而得來的詩學秘技。為了克服“影響的焦慮”,必須避俗、避熟,為了自鑄異境,必須苦吟,“每一詩成……幾病怔忡矣。”^⑭其三,“詩人非閔抱遠識,必無佳構。”(第302頁)這構成了一個小小的詩學理論體系:第一句是論詩標準,第二句是作詩技法和詩學門徑,第三句則係探本之論,直接指向詩性主體의思想和情感本質。俞明震的苦吟和低產,並非陳衍在私人空間對門人黃曾樾所譏評的

那樣,是因為學問不足,或“詩功恐亦止於是”,^⑤而是因為他的存在感受太過豐沛複雜,尋常表達已無法令其滿意。他的苦吟,既是表達獨特體驗的迫切需要,也是對“原創性”的自覺追求。知心論者應在古色斑斕中,認出他的獨特品質和現代屬性。比如,他的幽暗、沉冥及其對抗幽暗的努力,與魯迅有某種深層次的近似,足以說明舊體詩與新文學未必像表面上那樣壁壘森嚴。

對於自己的思想段位和詩藝境界,俞明震在內心深處自視甚高。^⑥1916年重九,他到龍井登高,曾有詩云:“世改性隨龍不滅,天高雲與雁同飛。”(第75頁)隱然以龍性自許。那天,他從龍井帶回一瓶泉水,回家後作烹茶詩云:“乞得甘泉留茗飲,夜瓶音裡隱龍泓。”(第77頁)移居杭州之初,他也說過:“養心漸喜知茶味,預汲寒泉入夜瓶。”(第74頁)“夜瓶”,典出東坡名句“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⑦蘊含著吐納宇宙的生命信息。而觚庵將龍泓泉水汲入瓶中,顯然也是一個微妙的雙關隱喻,透露出從此要將生命周納深藏的意味。實際上,俞明震的一生,不論是隱還是仕,始終保持著卓爾不群的人格。陳聲聰曾說:“(俞明震)詩中勞佚愉瘁,雖有不同,而蹇蹇自畫,龍性難馴,則為其本色。”^⑧可謂確評。俞明震對近代政治的洞見、對“意締牢結”的超越、對國族苦難的體認與悲憫,以及後期的自放、昇華和藝術創造,無不展示出“龍性難馴”的生命本色,其實質是對君子人格、深刻思想和非凡詩性的卓越追求。

最後,筆者想指出的是,俞明震以“觚庵”自號,也值得深味。“觚”,《說文解字》訓為“鄉飲酒之爵”。^⑨孔子說“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則做了隱喻化的處理。朱熹集注云:“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⑩由此而引申出方正之義,“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棱也。”^⑪可見,在儒家系統中,“觚”意指堅守理念、保持棱角,對不正義的政治現實保持獨立和批評的姿態。但“觚庵”之“觚”應當還有另一出典。《莊子·大宗師》云:“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⑫關於《莊子》之“觚”,郭慶藩疏曰:“觚,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遨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⑬王先謙集解云:“不堅,謂不固執。”^⑭大旨略同。可見,在道家系統中,“觚”意指能堅守內在的本質而又不固執己見。儒道二家關於“觚”的理解,實有相通之處,只不過儒家強調獨立和堅守,道家則強調圓融和通變。俞明震以“觚庵”自號,當然寄託著堅守真理、保持獨立、圓融通變和優遊獨化的自我期許。其人、其詩,在堅守中國古典文化精神的同時,也充分吸納了現代的思想信息,因而又蘊含着開放、複雜、深刻的現代性。

①⑤⑥汪國垣:《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46頁;第545頁。

②錢仲聯:《夢苕盦詩話》第295則,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六冊第373頁。《夢苕盦詩話》中有七則論及俞明震詩,分別是第33、34、283、293、294、295、296則,足見錢仲聯對觚庵詩的重視程度。

③馬亞中:《觚庵詩存·前言》,俞明震:《觚庵詩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3頁。

④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44頁。

⑤1926年,魯迅在《朝花夕拾·瑣記》憶及礦路學堂總

辦俞明震,稱其為“新黨”,詳參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二卷第305頁。1933年,魯迅在《重三感舊》一文中又說:“所謂過去的人,是指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民國初年,就叫他們‘老新黨’……‘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魯迅說這段話時,心中的摹本很可能是俞明震,詳參《魯迅全集》,第五卷第343頁。1936年,魯迅臨終前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也憶及1902年被派往日本留學之事,見《魯迅全集》第六卷第578頁。憑借這些細節,再加上魯迅日記中的記載,大致

可以勾勒出魯迅心中的俞明震形象。

⑥詳參韓定山：《民國初年的甘肅政局》，《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8~39頁。

⑦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62頁。

⑧俞明震：《觚庵詩存》，第53頁。下文凡引該書，一般只在括號中標明頁碼。

⑨即《舟行雜詠》其二自注云：“去冬回隊至寧夏，會匪已棄城遁。回隊入城，肆淫掠殺良民二千七百餘人，今尚十室九空，生計無論矣。”（第56頁）。

⑩即《曉發銅青峽望賀蘭山繞河套北行》詩所謂“遺黎對嗚咽，一去吾寧舍？”（第95頁）。

⑪胡先驕認為俞明震《送馬惕吾赴贛州》詩中“蒙馬以虎皮，一閱終自窘”等數語“洞中有清末季時弊症結”，“惟其如此，故清末受特達之知，自不必以遺黎自居。則出任民國官吏，不足為觚庵羞。視彼裝效黃冠，身受厚祿，而以‘諸夏無君出處輕’之語解嘲者，當有賢不肖之別矣”。詳參胡先驕：《胡先驕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第417~418頁。

⑫夏敬觀：《忍古樓詩》，北京：中華書局，1937年，卷七第27頁。

⑬詳參俞明震《台灣八日記》，《觚庵詩存》，第105~113頁。俞明震認為唐景崧優柔寡斷，缺乏勇氣。而幾十年後，陳寅恪因唐景崧的一副楹聯與其孫女唐筼結為夫妻。他對唐景崧的認知和情感與舅舅俞明震完全不同，令人感嘆。

⑭李瑞清：《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第38頁。

⑮1915年夏，俞明震度假後再次北上，陳三立有贈別詩云：“可憐寸抱關饑飽，未死閒情自往還。”詳參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69頁。俞明震辭歸之後，陳三立則說：“對汝宜衰疾，能歸有此身。灌園仍可樂，發詠得其真。”《散原精舍詩文集》第506頁。詩中雖有同情的理解和溫厚的友情，卻也流露出惋惜之意，透露出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微妙差異。

⑯詳參胡先驕：《胡先驕詩文集》，第417頁。

⑰Ideology是一個發源於十八世紀法國的思想史概念，意指支配人們行為的一套觀念系統。參見卡爾·

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72~73頁。梁啟超曾譯為“意底牢結”，而林毓生則譯為“意締牢結”，以強調政治觀念的思維固化作用，並多次在其論著中加以使用，參見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89、191頁。

⑱1904年，俞明震在與狄葆賢論詩時，曾指出“詩人非閒抱遠識，必無佳構。”詳參狄葆賢：《平等閣詩話·平等閣筆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⑲魯迅：《朝花夕拾·瑣記》，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5頁。

⑳馬亞中先生曾經指出俞明震具有啟蒙思想，《觚庵詩存》，前言第20頁。

㉑韓定山：《我所親歷的甘肅存古學堂》，《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2頁。

㉒陳三立：《俞觚庵詩集序》，《散原精舍詩文集》，第943頁。

㉓比如，俞明震有詩云：“自昔存祆教，深山鬼國迷。”（第25頁）又云：“鬼神畢竟誤蒼生，迷信何曾有宗教？”（第27頁）顯然將信教視為迷信活動。

㉔㉕㉖㉗《蘇報鼓吹革命清方檔案》，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3頁；第454頁；第454頁；第414頁。

㉘詳參吳稚暉：《與章炳麟書》、《答章炳麟書》、《再答章炳麟書》、《回憶蔣竹莊先生之回憶》、《蘇報案事前之回憶》、《蘇報案之前後》，吳稚暉：《吳稚暉全集》卷六，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70~74、94、330、377、412頁。另，《吳稚暉全集》卷十第54頁有《自蘇報案至赴歐日記》，詳細記載了會見俞明震的經過和雙方交談的內容。

㉙1908年，章太炎與吳稚暉在海外罵戰時，曾提及吳稚暉在探獄時向他透露的辦案細節。詳參章太炎：《覆吳敬恒函》，東京：《民報》，第十九號（1908年2月），第116頁。

㉚㉛吳稚暉：《吳稚暉全集》卷六，第411頁；第412頁。

㉜吳稚暉：《上海蘇報案紀事》，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一）》，第405頁。

㉝王敏：《蘇報案中革命黨人眾生相》，天津：《歷史教

學》，2009年第4期。

③④詳參章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章士釗：《章士釗全集》第八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153頁。

③⑤陳衍：《石遺室詩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5頁。其後，應和者甚多。

③⑥錢仲聯《論近代詩四十家》云：“觚庵詩由陳蘭齋入杜，早期詩未臻成熟。度隴以後，盤鬱蒼涼，乃得杜味。晚歲居杭州南湖，湖山勝景，盡歸筆底。雕煉幽邃，樊榭縮手。時流尚宋詩者，未能或之先也。”《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24頁。

③⑦⑤①陳衍：《石遺室詩話》，第195頁。

③⑧“國身通”在《觚庵詩存》中出現三次，程羽黑在《論觚庵詩》中已經指出。另外兩處是“哀樂盡時忘孔墨，國身通後見人天。”（1898年，第18頁）“國身通本春秋旨，海內從教索解人。”（1912年，第55頁）而且，曾廣鈞在《贈俞恪士以刑部主事改知縣之天津》一詩中也說過：“國身通一春秋指，孔思周情世孰知？”（第373頁）可見早在1894年，俞明震即已奉行國身通一之說。

③⑨董仲舒《春秋繁露》第22章即題為“通國身”。詳參蘇興：《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82頁。

④⑩黃濬：《花隨人聖庵遮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54頁。

④⑪出自俞明震致陳衍函，轉引自陳衍《石遺室詩話》，第49頁。

④⑫海德格爾認為，荷爾德林詩之所以深刻，是因為它切近祖國的本質和民族歷史之本源，詳參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1~26頁。

④⑬“心自沉冥氣瀟灑”本來是俞明震描述陳曾壽精神狀態的一句詩，語出《丁巳重九日登煙霞洞讀仁先六截句感賦即贈》，《觚庵詩存》第86頁。但用來概括他本人最後兩年的精神狀態也相當貼切。

④⑭狄葆賢：《平等閣詩話·平等閣筆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④⑮程羽黑：《論觚庵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④⑯貢布里希：《陰影：西方藝術中對投影的描繪》，王立秋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2、44、54頁。

④⑰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第142頁。

④⑱沈曾植《哀恪士》有云：“病餘意舒泰，氣乃溫溫春”。詳見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205頁。

④⑲陳曾壽有詩云：“君多身後言，談諧破煎惱。我習陵谷悲，常恐跡如掃。”陳曾壽：《蒼虬閣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17頁。

④⑳彼得·蓋伊：《現代主義：從波德萊爾到貝克特之後》，駱守怡、杜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第41、65頁。

④㉑夏敬觀：《學山詩話》，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三冊第71頁。

④㉒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8頁。

④㉓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第1018頁。潘靜如在評點《陳石遺先生談藝錄》時認為，石遺說詩有公私之分，公開場合“牽於人情世故，有闕有揚，浮偽並陳，未必遂暢其論”，而私人場合則“不媚於俗尚，有流於誇誕，真言往往出”。詳參潘靜如：《民國詩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5頁。

④㉔陳三立《俞觚庵詩集序》也說：“觚庵亦或幽獨自負。”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944頁。

④㉕蘇軾：《汲江煎茶》，《蘇軾詩集合注》，馮應榴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11頁。

④㉖陳聲聰：《兼於閣詩話》卷一，《兼於閣詩話全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6頁。

④㉗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94頁。

④㉘⑥①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頁。

④㉙⑥③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34頁；第235頁。

④㉚王先謙：《莊子集解》，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91~92頁。

作者簡介：朱興和，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240

[責任編輯 桑海]